

中西方诗学的碰撞

丛滋杭/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中西方诗学的碰撞

丛滋杭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方诗学的碰撞/丛滋杭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118-05826-0

I. 中... II. 丛... III. ①古典诗歌—中国—翻译—研究
②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482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frac{7}{8}$ 字数 209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68428422

发行邮购: (010)68414474

发行传真: (010)68411535

发行业务: (010)68472764



序

学术创新 科学评论

为《中西方诗学的碰撞》(以下简称《碰撞》)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写序,我是很高兴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认为这部专著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中译外的批评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发展,翻译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中译外和外译中的研究工作都在不断加强,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这是外语界同行们都引以为高兴的事。然而,有影响的翻译批评研究作品并不多,题材内容也不够广泛,有的评论言词空泛,缺乏导向性,这又是同行们常常不安的事。但是,在读到《碰撞》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时,却令人有一种先睹为快之感,我想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作者在《碰撞》里聚焦的研究,使读者会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丛滋杭,2007)一书。在这部著作里,作者论述了中国诗歌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英

译理论研究现状、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发展趋势、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技巧等诸多方面,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而《碰撞》就是对前书的明显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作者在新著里研究的并不完全是诗歌文学本身,而是在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或“文学性”。通过新书五章(共27节)的篇幅,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看出作者从中西方思维导同的分析,深入到诗歌创作的概念、观点,一一加以甄别;驻足于西方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思想和作品,探索西方诗学渊源;立足于古汉诗英译,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学流派的角度加以评析;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对英译的古典汉诗进行评述;阐释古汉诗英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展望中国诗学的发展及其翻译发展前景。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碰撞》是作者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论著,具有着鲜明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在收到书稿后,曾同作者通了一次电话,围绕相关学术问题,交换了某些意见。在问到她对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是否“苛刻”了一些时,滋杭认真地说:“我是一个‘小人物’,评论的话语可能有不当之处。但是,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了。”我想这是一个讲“诚信”的批评家的诚信态度。她在评论的背后,没有“人情批评”的负担,也未受到“红包批评”的腐蚀。她只想在经过条分缕析地对作家作品(译品)进行缜密分析之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还在想,凡是鼓励讲真话的人是不会因为某人或某个地方“片言只语”的欠妥而感到尴尬的。批评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所以,我赞同当代学者阎晶明的这种学术观点:“当代批评面临着环境建设和自身建设的双重任务。”真正的批评是充满难点的批评,是自身不断反思的过程,是与批评对象对话和互动的过程。要使批评成为一种令人信服、启人智慧的活动。深信作者会在阐释、对话中,成为大家坦诚相见和艺术上的“诤友”。我还深信,作家、作品或文艺批评家对人民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的义务都是一样的,都是愿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乐此不疲。《礼记·乐记》里

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其道，小人乐其欲。”对于中国优秀古典诗歌进行外文翻译，能引起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高尚的审美鉴赏情趣，感悟其精神实质，就是“乐其道”的译品，就能与作品互补生辉。勿须置疑，评论研究要努力做到科学，读者会热诚欢迎真正“乐其道”的科学评论。

其二，我认为在《碰撞》书中确实有不少亮点，“碰撞”出了学术研究的火花，是值得予以重视的。

丛滋杭同志作为一名高校外语学院的老师，有当过副院长的资历，履行过“双肩挑”的繁重任务。在卸下行政工作担子后，近年来不贪图安逸，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挑选的古汉诗英译项目，命题和立意也有着鲜明的特色。古汉语诗歌英译是一项跨文化工程，敢于承担这个选题的人就不很多。英译出来的原语（汉语）诗词，要考虑到译入语（英语）读者对象的差异，须采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势必要求古汉诗英译批评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中西文化理论素差；要求尽可能了解西方不同时期的译论观点及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论著；要求对不同译本有甄别能力，才好作对比、论证研究；还要求著者阅读大量的不同译者的译品（包括中国译者的作品和西方汉学家的译品）。面对着如此浩大的工作量，作者毫不退缩，总是坚韧不拔，有重点地梳理相关文献、资料。这种勤于治学、善于钻研的精神，本身就值得称道。更可贵的是作者在论著中敢于去粗取精，勇于去伪存真的严谨研学态度，以古汉诗英译作为自己的批评研究对象，努力拓宽思路，积极开展翻译批评研究，在认真的“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面前，不迷失主旨方向；在借鉴西方哲学、美学和翻译理论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我”所用，用来充实自己坚持多年的“诗学”研究，并时刻也不忘记教育青年学生热爱生我养我的本土（祖国）。坚持认为，汉诗英译工作并非只能由西方汉学家来完成，中国学者来译可能更加胜任。我们国家应该有计划地把中国优秀文化成果送到西方去，弥补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状态。还认为，借鉴西方互文性理论、读者接受理论、

翻译目的论等学术思想,有益于我们开展对古汉诗英译的批评研究工作,有助于拓展批评话语视野及得出客观、科学、理性的批评结论。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都是在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其生存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民族文化都需要平等的交流与分享,深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会在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赞同世界历史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同时,我们无疑要积极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的传统哲学、美学和译论思想。作者这种晶莹剔透地敢于正面告诉中外读者的批评研究家形象,不断跃然纸上。凡有着善意和良知的学者是自然会感到亲切并欣赏的。

其三,《碰撞》前瞻性的视野,亦为我们须有“文化自觉”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学术上要关注的问题明显增多。国际上总有那么一些“好心人”爱把学术探讨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无形中也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翻译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大大胜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其结果便是,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大大多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里,对于以往,除了有历史的、政治的种种客观原因之外,也是与我们自己重视翻译人才不够、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不够等主观原因分不开的。现在,正是到了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方法上都要认真来重新审视自己,敢于直面对待同国际接轨的大好形势。

2008年8月将在北京开幕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有“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主题。如何借助奥运会这个平台,更好地突出“人文奥运”特色,更好地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人文奥运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宣传中国优秀文化,一句是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季羨林)也就是

说,办好这一届最具特色的奥运会,也有益于学者开阔思路,增加创新意识,促使我们更加注意“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许渊冲)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碰撞》书里点评到的那么多国内外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的批评研究成果,即无论是在谈到功能理论、认知学说、等值观念、主体间性,抑或是在阐释“信达切”、“三美论”、“多元互补”、“翻译美学”、“融合感应”、“典籍英译”、“第三种状态”、“和谐说”等见仁见智的学术思想时,都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帮助读者“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思想。

最近,《光明日报》不断发表了“加强文艺评论,促进文化繁荣”的通栏文章。这对我们如何阅读《碰撞》一书也很有帮助。评论就是要立场、观点明确,就是要对学术氛围有正确的“导向”。“前不久,某文化明星面对广大电视观众信口开河,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一夜情’;还有人点评李清照时说这位古往今来令人仰慕的女词人是‘赌徒、酒鬼、好色’。这不能不说名利的诱惑对某些文化工作者的副作用。这样的现象让我们看到,如果历史评价、学术研究、理论批评完全商业化、娱乐化,势必造成这些严肃、庄重的门类失去公信力,出现泡沫化的倾向。”(李树声)

批评家有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当我们今天联系国家、民族的前途来看现实,又总是欢欣鼓舞的。远的不必多说,就看今年五月刚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八级大地震吧,那几十万官兵浴血奋战,那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及时有力,那党的深情、亲切关怀,领袖与人民(特别是灾民)乳水交融的干群关系,那昂起头颅和不屈脊梁的一个个英雄形象,那港澳台同胞和全世界华人的无私援助……,都是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勤劳睿智思想的体现,都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喷发,都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的表达。因此,世人看到了那震颤心灵的“地震文学”和那用激情打造的

“地震诗抄”，无一不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联系。眼见“老院古城化废墟”，马上“蓝图重绘建新居”！真是“空前灾难空前胜，再造辉煌入史书”。（刘征）这就是当代中华儿女的精神面貌和英雄气概，让世界上的一切真朋友分享着中国文化的丰盛大餐吧！让那些一直想苛责中国、羞辱中国、打压中国的种种假朋友也受到应有的教训吧！

我们深深感到古汉诗英译的现实意义及其光荣使命。一切从事翻译的实践家、研究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也是光荣的。因为通过他们默默无闻的“桥梁”作用，会让世人越来越懂得：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值得弘扬；中华民族早在远古神话中就有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的传说。崇尚英雄，热爱和平，热爱五洲四海的和平朋友，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积淀的基因。因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人也具有“文化自觉”性。用费孝通先生概括的话来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当代人及子孙后代的“同一个梦想”。有梦想就有美丽。因此，我想借此机会，祝愿早日好梦成真，也向一切热爱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读者及朋友们献上一份“温情与敬意”。

是为序。

李亚舒

于中国科学院院部 2317 室

2008 年 6 月 18 日



前言

在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我们有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如霍克斯将《红楼梦》译成英文;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也有一些翻译大家把唐诗宋词译成外文以饷国外读者等,但与我们一直来孜孜不倦地翻译外国作品、点评译文质量的好坏、译介西方翻译理论、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建立翻译学等等相比,这只是死水微澜,微不足道。埃文·佐哈尔指出:当“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时,我们的注意力常常放在大量地引进外国(西方)的东西上,研究的路子往往也是跟在西方学者之后,未能达到与之交流和对话的地步。

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开始注意到了中外译介的不平衡现象,呼吁加强中华文化精华的对外译介工作。随之而起的是对中译外的批评研究。“诗学”研究的不是诗歌或文学,而是“诗性”或“文学性”。本书是在作者原有研究基础上的深入和拓展。其意义有三:一是,以古汉诗英译

作为批评对象,试图拓宽和深入翻译批评研究;二是,借鉴西方哲学、美学和译学理论,为我所用;三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和翻译思想。

《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作者举出好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从半个多世纪前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称赞已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的英语水平了得,足可与之“平起平坐”,到最近几十年我国翻译家许孟雄、英若诚等人的比外国人翻译的质量“高出一筹”的译作,等等,说明我国翻译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把中国作品译介给世界。有学者对该文的反应是,上述文章仅是解决了“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或有没有足够的英语水平把中国作品译成合格的、优秀的英文作品”的问题,而没有解决“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他分析后得出结论:让国外汉学家与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内外呼应,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也许才能有效地把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介给国外读者,从而也能比较圆满地解决“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化”这一问题里面的“谁”的问题。发表在《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上黄俊雄的文章《“忠、优、美”翻译原则和“体”“神”“表”平衡模式暨汉诗英译实例分析与评估》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并通过分析、对照许渊冲翻译的古汉诗和他自己的译文来检验其可行性;二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认为古汉诗翻译应该西化。美国学者 Lefevere 认为佛经的汉译本中之所以有许多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道家)的词汇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且相对西方民族而言,中华民族较为“同质”(homogeneous)。与此相反,西方民族在本质上的“双语”(bilingual)性,使他们较能容忍外来的语言和文化成分。由此看出,在谁来译的问题上,人们往往采取偏激的态度,如认为,决定译者文化态度的首先是主体文化与源语文化的之间的“力量对比”,当主体文化处于弱势,需从其他文化汲取营养时,译者通常采取较为“恭敬”的文化态度;反之,当主体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时,译者则倾向

于采取相对“霸道”的“文化帝国主义”态度。人们也往往会引用多元系统理论创始人,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观点为证,即“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邻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上述这些说法固然有其客观道理,但不可否认,西方思维模式与东方思维模式的大相径庭确实起着不可调和的作用,西方的“二元对立”与中国的“和”文化可能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上出现不同观点。通常人们认为,汉译外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还涉及到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他们的乐与悲,爱与恨,怜与怨,喜与怒。谢振天认为:“国外汉学家在对原作的理解方面,也许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但他们对译语(也即他们的母语)的把握要比我们的翻译家娴熟,他们的风格令(他们的)译文读者在他们的国家赢得读者和市场。”显然,他突出了国外汉学家的作用。他从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得出结论:“要把一国文字、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部门或领导等),等等。”(2003:239)不可否认,国外汉学家用母语翻译我国的文学作品自然要比我们来得顺畅,更带“洋味”但同时不要忘了民族性的、土生土长的、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很可能就丢失了,纵然出版商利润再高,于弘扬我国文化有何益处?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有世界性。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用赘述,单凭感觉,就能体悟很多。比如说静与动、精神与物质、含蓄与直接、主观与客观,统一的集体精神与独立的个人行为等等。前者为东方人所喜爱,后者为西方人所偏好,不同的生活环境催生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又滋长出不同的认知眼光。于是,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接受心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

意境,中国人很讲究虚实相生、营造意境,而国外观众却很难感觉到我们所传递的这方面的意念。“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只此一句,虚实相生,动静结合,中国人能从中体味出很多的东西,西方人却很难说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有一个问题讲了多少年,那就是我们的影片节奏太慢,西方人不接受。要知道,快节奏,是绝对营造不出多少意境的。为什么我们的作品节奏拖沓,并不是创作者不懂得把握节奏,而是欣赏心理在作怪。一场戏,国外的作品或许几个动感强烈的中近景就交代过去了,而我们的作品却要在远景全景上多停留几秒,这几秒留给中国人的是意境,留给外国人的是什么呢?是节奏为什么这样缓慢。一部中国作品是由国外汉学家还是由我国翻译家来译成外文,我们相信,后者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向国外读者传达“原汁原味”的东西。至于翻译的“充分性”问题,只有留待于“对话”来完成。只有对话,才能保持平等的、具有自己独立个性特点的身份,才能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培植出来的东方式的艺术观念和形式特点。笔者赞同世界历史发展多元化的观点,是看到了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生存的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都是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而生成发展起来的,没有优劣之分。藏民族在世界屋脊创造了游牧文明,如果把西方的现代文明搬到藏北草原或者把游牧文明搬到西方城市,显然都是不适应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孰优孰劣。文化没有优劣主次之分,文化更需要平等的交流与分享,文化的民族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和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交流对话中会得到发展。

长期以来,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翻译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上都大大胜过中国文化(主要是文学)的翻译,其结果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大大甚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就翻译来说,我们的外译中力量大大强于中译外,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遗产的中国文化却带着“失语”症状,默默无闻地被遗弃在角落里。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仍和整个东方或第三世

界的文化一样,处于边缘地带,其内在价值除了得到少数汉学家承认外,远远没有被世界所认识。王宁是倡导建立中西方学者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平台的第一人,他呼吁:从翻译入手,发起一场“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和“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运动倒是有助于中国文化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消解单一的中心之神话,使之与西方文化达到共存共处、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境地。从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拿来主义”到近几年季羨林先生大力倡导的“送去主义”可以看出,二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旨在振兴中华文明,恢复世界文明史的真实面目,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脚步更快地向前迈进。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虽然被一些人认定已经构成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化阴影之中,没有产生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于东、西方即有传统的真正“世界化”的文学,但不容否认的是建立在民族救亡图存、社会拯衰起弊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一代学者渴望复兴中华文明而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吁求。近几年,季羨林主张,在拿来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全球化时代给中华文明再度兴盛,重新在世界文化的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带来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契机,有目的有计划地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送到西方去,以弥补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状态。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汉语古诗的英译热潮,其中以 W. Bynner, W. J. Fletcher, H. A. Giles, A. Lowell, Shigeyoshi Obata, E. Pound, A. Wally 等最为代表人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言学家吕叔湘辑录了那个时期的英译汉诗,编纂成《中诗英译比录》。此书直到今天仍为诗歌翻译者和研究者借鉴。从吕叔湘、闻一多等老一辈译论家开始,译文是以相对于原文的忠实度作为评价标准,裘克安、高健、刘重德等人的译论采用的都是同一评论模式。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汉学家翟理斯(Giles)曾把唐诗译成韵文,得到评论家的好评,如英国作家斯特莱彻(Strachey)说:翟译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汉学家韦利(Waley)认为译诗用韵不可能不因声损义,因此他把唐诗译成自由诗或散体。我国学者翁显良先生也是散体的身体力行者之一。一方面,他主张古典汉诗英译要保有中华古国的情味,“完全西化,本色尽丧”。鉴于西方人在这方面表现出的两种倾向:“或者不顾原作的情味,唯恐不洋,这固然要失去本色;或者企图以语言形式的汉化来保持本色,这也无济于事”,他主张汉诗英译未必不该由中国人来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但求形似,势必变相;舍形取神,才能保持本色”。在他看来,对英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传统,两种民族心理,要见其同,尤其要见其异,要见其外表的差异,尤其要见其深刻的内在差异。既然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那就只得舍其一,保其二。

谈到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就不能不提到许渊冲先生。他不但将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更为可贵的是他把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使世界文化更加灿烂辉煌作为己任,在翻译实践的同时,更是提出了富有创新的译诗理论,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他的著名的“三美论”和“发挥译语优势论”在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收。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他的译诗主张持反对观点的大有人在,刘英凯先生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文就三个问题,即“无韵非诗吗?韵体译诗利弊孰大?应走《鲁拜集》的道路吗?”对许先生的观点加以辩驳,并认为许先生提出的以格律诗译格律诗是以韵害义。关于“优势竞赛论”,有学者认为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并理解为就是滥用中文成语,像“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寅吃卯粮”等。还有学者将此比作挣脱“紧身衣”,恣意满足译者一己表达欲的翻译。另有学者指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流是碰撞与交融,而竞赛的目的是要取胜,是要发挥目的语文化优势,战胜出发语文化,因此,与翻译的最高

目的——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不符的。这场讨论虽然并未分出胜负,时至今日,在译界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事实上,对许渊冲的理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认识问题。创作和翻译都可以比作绘画,创作以现实为模特,所以翻译就不能只以原作为模特,而要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两种不同的文字要表达同一内容,总有一种文字表达得好一点,一种差一点,或者两种文字不相上下等这三种可能。表达得好一点的就处于优势,差一点的就处于劣势,不相上下的就处于均势。西方文字之间差距较小,做到均势比较容易,中西文字之间差距较大,要做到均势就不容易。因此,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应该扭转劣势,争取均势,最好能发挥优势。其实,即便是那些反对他观点的学者在他们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也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发挥出汉语的优势,从这点上看,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许渊冲正是总结了董乐山、傅雷、朱生豪、杨必等的妙笔才得出的这个结论。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许渊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诗词翻译,而诗词翻译“真”与“美”的矛盾尤为突出。江枫指出:“译诗,不能不是再创作,甚至在理解和欣赏这一环节上就不能不是再创作。”既然是再创作,那么,要“以创补失”就是就很自然的了。许渊冲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的创新意识及其开阔的思路。由汉诗英译扩展开去,近些年来典籍英译正以较强势头发展。2002年召开了首届中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及后又在2003年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集结的论文已经正式出版,这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开始了理论准备。从内容看,古汉诗英译占有不少篇幅,有论汉诗英译原则、有论汉诗英译风格、有论汉诗英译的意象处理、有论汉诗英译的文体、有论汉诗英译中的文化阐释与文化定位、有论汉诗英译中译者的创造性,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对于汉诗英译的认识,人们还是趋同一致的,那就是以诗译诗、传神达意、包容理解、追求“三美”。

翻译主体的首次提出,引导人们认识主体对翻译的重要性,突出了人的主体的自觉性以及主体对于翻译所形成的先决条件。

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突出单一主体的作用,而不顾及翻译的对话性质及其牵涉到的各个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众多主体的创发作用。由此申发,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进入到中国人的翻译研究中,得出结论:翻译是两个主体、两种语言或文化的“间”形态。学者们纷纷就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展开思索(许钧,1998)、杨晓荣提出了“第三种状态”(1999)、郑海凌的“和谐说”(1999)、蔡新乐关于翻译的本体论研究(2005)、刘华文关于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2005)、韩子满关于翻译的“杂合”理论研究(2005)等。应该说,在西方翻译理论的不断引进和译介之中,中国学者开始跳出原有文本批评的樊笼,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开展了理论研究。

“第三种状态”的提出即为一例。我国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即为“无过无不及之道”,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前两者是恶行的特征,只有第三种才是美德的特征、道德的标准。在翻译中,如果既不是借原作者之名以营私的胡译,又不是拼凑字典的死译,信息含量乃至轻重、色彩、分寸等都很妥帖,合乎具体翻译目的的要求,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中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三种状态”主要就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而论,因此具有广泛性和一般性。具体到古汉诗英译,普遍性中又存在特殊性。诗歌的符号性存在往往要大于它的物性存在,也就是说一首诗首先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铅字印在白纸上,而是由一连串的符号组接而成的,它的物性实存往往要小于它的符号性虚存,这种虚存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作为物性存在的诗歌不会产生疑义,但符号则不然。这种存在需要人在具体时间和境域中的解读才能活跃起来,因此必然会引起诗歌中原有信息量的变化以及审美特质的嬗变。译者作为诗歌翻译的主体同样也是解读者。诗歌的这种当下性、历史性和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必须借助于人的主体性解读活动才能实现。

刘华文提出的“他我融合感应”旨在把中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模式有机地融合到古汉诗英译中,这反映了一种美好愿望。古汉